



苏智良在（左）上海书展签售《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

当时的华界。至于租界，日人当时并未进兵。国民政府也看到这一点，希望在上海的战事让世界看到。因此，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等，几乎就是在打给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人看。也有人说，新闻记者们在租界里喝着咖啡看河北岸的战事。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会注意国际观瞻。”苏智良分析，“而南京的情况与上海是不同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日军攻陷南京后，部队上下都有一种放纵感。同时，为了震慑中国，令中国军民尽快屈服，使出了大屠杀的卑劣招数！”在苏智良看来，日军所为，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令全民抗战的中国人更团结。但苏智良仍总结认为，首先，从成立模式上来说，南京安全区基本仿效了南市安全区。在南京的西方人组成了筹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先与中方取得联系，得到中方支持，之后通过种种渠道与日方联系。其次，从管理模式上看，南京安全区也大量借鉴了南市安全区的经验但两相比较，苏智良认为，两个安全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南京安全区没有似南市安全区那样有强有力的国际社会包括租界方面的支持，而南京安全区粮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最终于1938年2月18日宣布解散。“南京安全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军暴行，保护了难民生命安全。之后，汉口等也尝试成立安全区。唯有南市安全区，顶着日军压力，以及之后成立的汪伪政权压力，直至1940年6月饶家驹回国才关闭。”

饶家驹曾在南市安全区成立时所发声明中提及：“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建，且望欧洲等处，亦能仿行，为益匪浅，谅不可河汉余言焉！”苏智良认为，这一声明，深深地表明饶家驹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是救助难民，并表达了希望安全区可以在欧洲等地得到推广。

1949年8月12日，上海南市安全区被写进《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战时平民保护的光辉范例。苏智良认为，由此可见饶家驹与上海共同创立的安全区，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只是此时，饶家驹已经故去——

1940年，得知德国入侵法国，饶家驹取道香港返回巴黎。他想要在巴黎建立安全区，以保护同胞，却因为响应者少无法实现。1945年夏天，饶家驹受国际红十字会委派，奔走于欧洲。及至德国战败，饶家驹前往柏林救助德国难民。“这真是大爱精神。他不计前嫌救助一个侵略过自己祖国的国家的难民。”苏智良说。但也正是在柏林，饶家驹积劳成疾，于1946年9月10日16时40分病逝于柏林。

2024年9月3日，抗战胜利79周年纪念日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来到上海城隍庙，缅怀被遗忘的英雄饶家驹。苏智良向曾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古特雷斯娓娓道出一位法国人在沪倡导建立安全区的创举，以及成果——拯救了30万难民。这样的人物，不该被时间湮没……

9月2日，“中法论坛：多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上海师大举行，与会嘉宾探讨了饶家驹的贡献。

